# 第一章　儒家与古代社会

在世界文明史上，曾先后出现过许多古老的文明，像古埃及、古罗马、古巴比伦、古玛雅等，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们或中断、或消失、或毁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且有着五千年以上历史的中国古代文明不仅没有衰亡，相反是历久弥坚，至今绵延不绝。尤令后人赞叹与深思的是，作为这一文明的主体象征和现实载体的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国，虽历经分分合合的波折与磨难，但却日趋统一与进步，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前的古代世界中，她堪称是强大与发达的国度。对于中华民族这一顽强的生命力和伟大的凝聚力，海外学人也深感惊叹，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在他们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曾如此评述道："几千年来，中国人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

不少学者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持久和强大的凝聚力，先人所生存的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东、南临海，西、北则是群山和无垠的沙漠，古代简陋的交通工具极大地限制了先人的交往范围，在缺少不同文化交流的情形下，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自会得以逐渐强化。这类分析当然有道理，不过我们以为，地理的因素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它毕竟是一种外在的环境，并非是内在的决定因素；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来看，促进华夏民族的团结和凝聚，推动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内在原因是儒家文化，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仅提供了先民彼此认同的最广泛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理论支柱和精神依托。在古代中国，完全可以说，没有儒家，也就难言国家。

## 1. 礼 崩 乐 坏

在说儒家思想之前，先来看看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公元前 551一前 479)。从他的生卒时间可见,他生活于春秋时期。儒家思想所孕生、形成的这一历史时刻,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春秋恰是中国古代史上充满变革与动荡的年代。周在灭商后，曾形成一广大集权王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歌咏的正是这一景象。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周天子还大封同姓诸侯“封建母弟”,形成了众多藩屏的诸侯国。不曾料想的是周平王东迁后,天子权威一落千丈 臣不再听命于君,相反,各路诸侯纷纷割地称雄,网罗人才,耕战强兵,互相征战,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到了春秋末期，经过数百年的厮杀，只剩下秦、楚、齐等十几个势力较强的诸侯国了。此时情形恰如孔子所说的是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文中的‘无道’,一方面表现了孔子对‘陪臣执国命’的不满，同时却也显示了当时周天子权威的衰落。这是春秋社会的一大现状。

其次则是礼崩乐坏的秩序紊乱。它主要是指等级制度的被破坏。如季桓子用天子乐舞而‘八佾舞于庭’,三桓家族送宾、祭祖时唱天子专用的赞礼诗《雍》。凡此种种,都是一种非‘礼’的表现,孔子就此曾愤怒地说过‘是可忍,孰不可忍!’所谓‘礼’乱,亦即是名分的不清。

又其次,在此亘古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局中,“周礼”以及从更远的年代传下来的“人文”,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犯上作乱、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现象,比比皆是:“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并揭露争霸的诸侯是在以人民的尸骨来扩充地盘,来谋取霸主的地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最后,则是夷夏矛盾显露。所谓“夷”,即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均较落后的各少数民族;而所谓“夏”,即意指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族,汉以后则主要指汉族。夷夏问题,以后会有专门的讨论,这里不作展开。夷夏之间本就有纷争,春秋时期,各路诸侯忙于彼此间的兼并,于是周边四夷趁机蚕食、入侵中原,一度还曾出现了“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公羊传·鲁僖公四年》)的危急局面。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春秋时期,社会处于风云激荡之中。生存与毁灭,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交错互映,呈现出一派光怪陆离的复杂景象;社会的大分化与大组合,一方面固然透现出了新的历史生机,但另一方面却又使三代以来所积累的礼乐文明产生了严重危机。于是重整社会秩序,制止残酷的战争,巩固华夏文明,探讨历史发展的方向,成为当时所有智者共同面临的任务;孔子尚仁重礼、正名辨华夏的思想特色,无疑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总之,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就已预决了儒家学说的入世本性和思想特色。

## 2.“儒”与儒家

何谓儒家?别看它是一个人们经常引说的名词,似乎妇孺皆

详，但其实由于其间所包容的丰富历史内涵，却又是难以轻易界说的。大体上可以说儒家就是古代的职业知识分子；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原儒墨》）。那么是否古代的知识分子都可称作儒家呢？这却不能。因为与儒家同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还有其他诸学派，如道家、墨家、农家等等，他们中大都是知识分子，但彼此思想差异却甚大。从文献记载来看，儒家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有着自己特殊的政治见解与学术主张。这一点先秦时的哲人就已见出。如庄子在综述天下纷纭的学术大势时，就指出“邹鲁之士”崇仁尚义（《庄子·天下》）荀子在议论诸子时，称孔子学术尚古、重秩序与和谐（《荀子·非十二子》）。其后对儒家思想的评述更多。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是说儒家学说内容固然繁琐，但有些方面是别家不可替代的，所谓“百家弗能易”，即指“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为儒家所独创、独享。又如《汉书·艺文志》在讨论历史上六大学派的特质时，这样概述儒家学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这儿不仅肯定儒家学术地位杰出，也道出了其要意在“仁义之际”；而其间尤重人的价值。宋儒陆九渊在辨析儒与释的差异时，曾这样写道：“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陆九渊集·王顺伯》）而佛教的要义则是：“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陆九渊集·王顺伯》）。

由上可见，古代的儒家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有其特别的学术倾向和政治偏好的知识分子，即学宗尧舜周孔，要在重人而关注人伦建设，倾心于国家治理。

任何事物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客观的过程，儒家的出现也当如此。大家知道，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史籍中也是这样说的："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析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淮南子·要略》）。如果说孔子从"成康之道"和"周公之训"中创造出儒学，那么显然，儒家思想的源头就远在孔子以前的先哲言行中，在此意义上，作者以为陈来先生的"儒家思想是接续着三代文化的传统及其所养育的精神气质的，儒家思想的一些要素在三代的发展中已逐渐形成，并在西周成型地发展为整个文化的有规范意义的取向"（《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的说法，很有见地。

如果再往上追寻，儒家竟与上古时的巫祝迷信活动有不解之缘。原来儒家是从"儒"蜕变而来的。当代学者冯友兰先生指出："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之一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哲学史·原儒墨》）。教书好理解，大体即为私塾先生；而所谓"相礼"则何意呢？原来先民重丧葬，其间有许多程式和礼仪，一般人难以掌握，故而也就出现了一种专门为人操办丧事的人，古称"儒"，孔子"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所言正是"儒"之业。墨子曾就此讥诮"儒"道："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至于此"儒"的前身，古今中外的学人虽有很多不同的见解，但大都承认其本意与先民的神灵崇拜有关，即原始之"儒"是巫师一类的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职人员。甲骨文中有‘需’和‘濡’字,一般认为,此即‘儒’字原形,因为‘濡’与‘儒’在古代互用,如段玉裁就这样注解《说文解字》中的“儒”字: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风俗通》也肯定‘儒者,濡也。’据徐中舒先生解释,甲骨文中‘需’之意为‘斋戒沐浴’,实即从事巫祝一类活动的神职人士。日人白川静所谓的“需,系含有为需求降雨而断发髡形之巫的意思,如此的巫祝,乃儒之源流也”(《中国古代文化》)也是此意。

古文献中又常以‘柔’释‘儒’,如《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对此‘柔’,有学者视之为柔逊的处世态度,如胡适就认为儒作为殷遗民,亡国的历史背景迫使儒小心做人。杨向奎先生则以为‘柔’体现着‘儒’的形体特征:‘他们的宽衣博带,……给人们的印象是迟滞缓慢,而且相礼职业的本身要求也是如此。’本文以为,‘儒’所从事的‘祝宗相礼’职业,在鬼神迷信盛行的时代,必定是一种神圣和庄严的职业,而且通鬼神大概也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专长,否则也难以沟通此岸和彼岸。故而从事神职之“儒”,是既有文化修养又久受程式礼仪熏陶的人士,因此他们的“柔”实是其庄重、严肃、有知识的职业性质的表现,故视‘柔’为彬彬有礼,恐怕更符合其本意与历史实情。后来孔子突出强调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外在特征为‘彬彬有礼’,怕就是早期‘儒’的历史遗迹。

如果说早先(殷商以远)的‘儒’是事神的话,后来的儒家则是以事人为旨归了。关于儒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又有出于‘司徒’之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而在古代社会,‘司徒’是掌教化之官,《周礼》中明确‘大司徒’有‘十二教’: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鹜;八曰以誓教恤,则

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由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儒家出于“司徒”，则显然与“人文”教化有关，而且他们也必然拥有这一领域的专门知识。上引《史记》所说的“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汉书》所指称的“助人君顺阴阳之教化”等等，都显示了此时的儒已不再是事神的巫师，而是通古今之变，化成天下的专门学者了；换言之，此时儒所倾心的是人伦世事。

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大概就是孔子思想形成。此如前引《淮南子》所谓的“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此时的儒学就意在事人而不是事鬼了。到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众所周知，儒家以其仁政、以其内圣外王、以其论人不问鬼的学术旨趣，彻底告别了其早期的事神迹象，而成为一关注“王化”与“人文”的“显学”。

由事神到事人的这一历史性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出现从“儒”（需）到儒家的这一大变迁？这些问题甚为复杂。作者以为，这与上古的社会变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天人关系的裂变，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甲骨文以及中国早期史籍的记载可以看出，上古时先民有着严重的天命鬼神崇拜，大凡刮风下雨、庄稼丰歉等一切天象人事，都认为是由人格神“天”来主宰和控制的。当时的统治者也深信自己的权位有天命的护卫，如胡作非为的纣王，在灭亡的前夜仍不知悔改，仍然叫嚣：“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殷纪》）。但是，汤武革命却打破了天命的幻影。汤武中兴的事实也雄辩地证明：天命不是万能的，民心的向背才是最终的决定力量。故此，商周以降，“天命有德”的思想迅速滋生、扩散开来，在社会政治和人事领域，“吉凶由人，自求多福”与事在人为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主宰的天命日渐崩落，人的地位与作用日渐突出，这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可得到广泛的印证，其突出的代表就是孟子所说的“得民心者得

天下”之论。在天命信仰未被破除的情形下，事鬼神自是不可避免的；儒”(需)只是广大信众的代表，专职于奉神而已。而一旦天命破灭，社会既不再需要‘儒’的这一作用；儒”本身也会从世事巨变中体悟‘天道远，人道迩’的奥义，转而潜心于‘人道’的运作探讨，以服务于新的社会需要，否则其自身的存在也就失去了理由。儒家鼻祖孔子罕言“怪力乱神”，力主‘事人不事鬼”，都切实地表现了这一趋势和结果。总之，站在思想史的层面上看，从‘儒’到‘儒家’的演变，实是古代天命观念陨落的一种历史折射。

从‘儒’到儒家有一渐进的形成过程。其实儒家学派诞生后，在历史上也有一个曲折发展的经历。孔子在世时，儒学是统一的，孔子一过世，儒学就呈现出了分裂的趋向。据《韩非子·显学》的说法，是儒分为八派：“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更是形态各异。如在两汉，儒学又主要表现为经学，在魏晋则展现为玄学，在宋明时期则以理学的样式出现，而在清朝则是朴学(汉学)。学派是由学者支撑和推动的，如先秦儒学是由孔子、孟子、荀子代表和体现的，思想大旨是尚仁尚礼；后世由于儒学代表人物学术风格的差异，使得不同时期的儒家思想有着不同的特色。如西汉的董仲舒，他以其“天人感应”而使其时的儒学带上了不少神学神秘主义色彩；宋明之际的诸大儒——如程氏兄弟、朱熹、张载、王阳明等等，由于他们喜谈天理、心性，固使此时的儒学呈现出极为浓厚的‘道学’思辨性。另外，从学术上看，儒家在自身的发展中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传说中孔子就曾求学于老子，魏晋时期的儒者更是出入于儒、道之间，王弼、何晏之类的学者，其思想就是儒、道的混合物；佛学传入后，儒家虽然奋力抗击，如唐朝的韩愈、清朝的王夫之，但不少著名的大儒都曾倾心于佛学，如刘禹锡、张载、朱熹等，在某些特殊的历史

时期，佛学与道教还曾受到官方的青睐，如唐朝的一些皇帝就既崇佛,又礼道,朝廷还举行过“三教会议”以协调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无疑都加强了佛学与道家思想对儒学的渗透，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儒家吸取了其他学派的见解与主张。事实上正是在此历史的融合中，儒家不断发展壮大。

儒家在历史上虽然有分化流变，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状，虽然有与诸子各派的融合，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的队伍不仅越来越庞大，而且其思想宗旨与学派风貌也更加突出与鲜明，这就是：以孔子为领袖，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以修齐治平为寄托，以三纲五常为准绳，以仁义忠孝为道德，这也可以视作儒家的一个小定义。

### 3. 走向“显学”

作为一个学派，儒家虽然早就受世人关注，但并非一开始就是“显学”。春秋战国之际,各种学术思潮云涌,从《荀子·非十二子》和《庄子·天下》等篇中不难发现，当时的思想派别真似百花争艳、百舸争流，儒家只不过是其间的一个分支而已，而且有段时间还是很不起眼的一支弱流。大圣人孔子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就不怎么被看重。他虽然弟子成千,周游列国,一生“干七十余君”,但始终未能得到重用,相反还常遭到困辱,史载的“陈蔡之厄”,弄得孔子及其弟子“七日不火食”,“弟子皆有饥色”。这就生动地说明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学在当时还未能安享尊荣，还时不时陷入穷困的境地。从《史记》中我们还可看到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对孔子有好感,想把尼溪之田送给孔子，晏婴不同意，并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从中不难看出，其时孔子及其学术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公认。

到战国时，这一局面尚未有根本的改变。战国早期的孟子（公元前 372一前 238)就曾披露过，他那时异端邪说横行，孔子之说几有被遮蔽的危险“：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所谓“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即是说杨、墨为当时的主流学派，占据着学术霸主地位，其他流派难以与其相抗衡；书中还透露，孟子当时虽然是极受推崇的大师，但以许行为代表的神农学派，依然吸引了许多学子前往聆听，楚国儒者陈良及其弟子陈相，就大老远“自宋之滕”求学于许行“；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孟子·滕文公上》)。这就足显神农学派的影响。不过从孟子的话中也不难看出，孔子的学术虽然在当时尚不是“显学”，但在孟子看来却是绝对与至当的，否则他也不会辟杨、墨了。稍晚的荀子(公元前 298—前 238)则更为强烈而明确地表现了尊孔的意向。他在《非十二子》一文中这样评说道“：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戒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最早称儒家为“显学”的是战国时代的大法家韩非。他在《显学》一文中说：“世之显学，儒墨也”。有论者以为此“显学”为“显著的学派”，笔者以为《吕览·当染》的“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可谓是此“显学”的达诂，即此学派不仅有强大的学术影响力，且成为规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思想的“思想”，故为“显学”。历史地看，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正式确定了儒家的“显学”地位。西汉武帝时，董向皇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贤良对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端，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邪辟之说灭亡，然后纪统可一而

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一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遂定儒学于一尊，使儒学成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

为理解儒学的“显荣”,又可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孔子及其传人受到尊崇，二是儒家思想独步天下。

先说前者。在先秦，孔子主要只是受其弟子的尊敬，如他的门徒曾夸赞他而说过“高山仰止”“夫子贤于尧舜”“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孟子·公孙丑上》)一类的话,但其他人并不这样看。《论语》中就记载，当时就有隐居的高人指责孔子及其弟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儒学定于一尊以后，情形则大不同了。孔子逐渐被神圣化，被视若神明。历史上的帝王尤热衷于此。汉高祖刘邦就为孔子设庙,特加尊崇 唐高祖李渊称孔子为“先师”,并为其立庙,四时祭祀 元统治者则崇视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成祖朱棣夸孔子为生民以来最伟大者,他说“:道原于天,而畀于圣人,圣人者继天立极而统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汤、文、武、周公,圣圣相传,一道而已。周公没,又五百年而生孔子,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贤于尧、舜,故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夫四时流行,化生万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与天道诚无间焉,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在当时之论如此，亘万古敢有异辞焉。呜呼！此孔子之道所以为盛也，天下后世之蒙其泽者,实与天地同其久远矣”(叶盛:《水东日记·重修孔庙碑文》)。清世祖曾三赴曲阜参拜孔庙,康熙也赞孔子为“万世师表”。不仅孔子,后世一些大儒也极受推崇,如宋理宗时,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等,被列入孔庙而广受礼拜。历代的做法虽有差异，但一致的都是奉孔子为庙堂之上的圣人，奉他为神圣的精神偶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随着孔子地位的剧变，其所代表的儒家学术也就跟着倍受推举。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之后，汉宣帝曾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汉章帝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厘定儒学经典，确定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为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唐太宗虽兼尊儒、道、释，但对儒尤为倾心，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政观正要》卷六）。宋真宗亲作"《崇儒术论》，刻石国学。"（《宋史·真宗纪》）。元世祖也宣称："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清康熙对大儒朱熹也是推崇有加，他说："（朱子）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御制文集》第四集第二十一卷）。历史上一些封建帝王还曾亲自讲经，除前述的西汉宣帝、汉章帝以外，又如东汉明帝"乡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实际上听讲的人数可能没有这样多，但这却也显示了儒家学术所受到的推崇。

伴随着孔子的神圣化，他的著述以及其传人的著作，渐渐被奉为经典。记载着孔子思想的《论语》，在西汉文帝时就已被奉为"经"，并特为之设博士之职。史传《春秋》、《诗》、《书》、《礼》、《易》，均为孔子所作，或经孔子而修订，故它们在汉代均已升格为"经"；唐时设立了九经——《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诗》、《书》、《易》。宋代又将《孟子》列入，故有十三经之说。宋大儒朱熹则设立了影响久远的《四书》经典。他升《孟子》为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集为《四书》，并为之作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儒家又一部重要经典。关于"经"的字义，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如班固在注释《白虎通义》时，释"经"为"常"，即恒常的原则和道理；而许慎的《说文解字》则解"经"为直线。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儒家著述被捧为"经"，不仅是一般的推崇，

儒学不仅仅是一般的学术典范，而实是作为一种绝对真理的载体，似如西方的《圣经》一样，成为终极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的精神依托。近代闻人康有为甚至还要把孔学升华为“国教”，在百日维新时期，他特为此上书皇上，奏折名称就是《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这固然似如昙花一现，但却折射出儒家思想在旧中国的特殊地位。

儒家著作经典化后，它自然也就成为古代教育的标准读本。如上述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就是宋以降官方的教科书，而且元、明、清三代的科举考试，命题皆出自《四书》，答案一律以朱熹的《集注》为准。由此不难想见儒家思想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科举取士依傍儒家经典，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教育内容也必然取之儒家思想，否则就难以“干禄”了。不论是民间的私学，还是国家办的公学，学生学习的教材与内容都出自儒家。如东汉大哲学家王充曾这样回忆道：他八岁入书馆，入馆前，先从父识字，后入馆学书，再辞师受《论语》等（《论衡·自纪》）至于官方办的高一级的学校，则无不以儒家经典教学生。如明代的国子监，就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课本。儒家思想不仅成为普通大众教育的范本，而且也成为封建帝王的教育依据。历史上每一朝的皇帝和太子都设有太傅和少傅之职，专职为皇上讲解经义。秦汉以后，充任此职者无不为儒学名家，如西汉精通儒家思想与礼义的叔孙通就被刘邦任命为“太子太傅”而且所讲述的内容也无不是儒家的精义。东汉光武帝时，桓荣为太子少傅，他教授明帝的就是《尚书》；名儒包咸，建武年间为郎中，以《论语》教太子，其子包福，则继续以《论语》教和帝。二千年如此教下来，日积月累，儒家思想对封建帝王的影响无疑是极为深厚的。

在纸的发明和活字印刷术运用以前，文化人求书不易，“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在此以后情形则大不相同

了“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文化从此不再是少数贵族的宠物,而是广大人民都能有机会享有了。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和创造,使得经书有可能被大量地复制、修撰,事实上,中国古代历届王朝都十分重视经书的编撰,清代的《四库全书》就是其间的典范。这样,经书既被很好地保存,也同时得以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历史上不乏一些大胆的学人,奋起反抗儒学独尊的思想局面。这数明代最多。如以“心学”著称的王阳明,就甚为不满学以孔子、朱熹为旨归:“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何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辈,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言出于孔子者乎”,又说“学,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答罗念奄书》)。其后的李贽,以思想的异端性而闻名于世,他更为激烈地反对孔学的统治地位,主张儒学经典不是绝对真理“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憧憧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憧憧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焚书·童心说》)。他更明确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答耿中丞》),又说“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王、李之论虽然言之有理,也有很大的启蒙意义,但却并没有得到共鸣,相反,两人的思想一直受压抑和排斥,李贽甚至因其

大胆言论而被迫害死在狱中。这也从反面衬现出儒学的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

总体上看，封建时代仍是孔学的一统天下，不论是封建帝王，也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儒家思想都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成为人们的信仰和价值准则。清经学家皮锡瑞下面这段话很清楚地表现了这一历史状况“：(孔子)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经学通论·序》)。

## 4. 道　　统

儒学之所以成为“显学”,不仅在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亦在于儒家自身的着力维护和发扬“；道统”论就是这一维护的特殊的标志。

考之史籍“；道统”一词首见宋代李元纲的《圣门事业图》,其后朱熹作了更进一步的阐明。他在《中庸章句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可庶几也。”这儿的“道统”,大约是指华夏文明的主题和核心。在古代文化中，它被认为是往古圣贤（尧、舜等）所创造的；但在孔子后，道统则转为对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大义的传承与维护。沐浴孔门教义的儒生，无不以此为旨归。战国前期的孟子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

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文中一方面表现了孟子焦虑于孔学后继乏人,另一方面又透现出孟子以孔学传人自许的微妙心态。孟子这一心态为后儒所继承。如唐代的韩愈,就认为华夏文明有一生生不息的大传统,孟子以后不幸失绪了:“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他自觉有责任上接孟子:“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宋大儒朱熹,也循此思路,以传道自许 所不同的是,他以为二程兄弟上接孟子,因此他所要继续的是二程的未竟事业:“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乎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指《中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四书章句·中庸章句序》)。“立志于为圣贤”的朱熹,正要传此“说”;“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集注》)。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以“宏道”,即以传承孔孟之学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清大儒陈确下面这番话,就颇能表现这一心态:“弟

老病渐加，死期不远，一切已置之度外；惟以圣学久诬，恨之入骨，虽死不瞑。……弟病困日甚，……自反所学，毫无长进，惟一二辨学书，庶几效忠先儒，相与共扶古学之意”(《陈确集·复张考夫书》)。前面说过，儒学在其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既遭遇异民族入侵的冲击，又有外来的佛教文化和本土的道家文化的彼此激荡，而儒家之所以始终保持自身在学理上的统一性和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除了政权的支持外，历史上无数儒士的“效忠先儒”，则是内在的支撑力；儒学这一庞大的体系，不是任何一、二大师所能构造的，而是在历史的演进中，大量的如韩愈、朱熹、陈确一类的学者，前赴后继，代代相传，使得孔子所传承的古代文化得以生生不息；同时，这也使儒家学术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统一性，这既便于学者，也便于民众的学习与认同，当然也更便于统治者的统治，从而使得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发挥着长期、持续和决定性的影响。

### 5. 儒如五谷

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除统治者的支持和儒家自身的努力以外，儒家思想的切合实用，为社会所需要和欢迎，则是其成为“显学”的又一重要原因。

汉以前，儒家作为一学派，固然也很有名，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亚圣”孟子的思想，还被当时的人嘲笑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刘邦建立汉朝后，情形则大不同了，武帝时竟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一政治局面，儒学真正成为“显学”。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儒家思想本身符合新的社会需要，则是直接的因素。史称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原先甚为鄙薄儒家，还干过“溺儒冠”的恶作剧；但叔孙通引入儒士与儒家礼仪，把朝廷秩序整治得井井有条后，刘邦方深感儒家的有益有用。于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